

散文卷

张贤亮
作品二典二藏

美丽



张贤亮亲题书名·30年精品全面收录

譬如今天，仅仅枪毙了十几个人却让上万人看得开心，可说是“牺牲了十几个，快乐了上万人”。他们只有以“闹着玩”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。不正经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经的态度应付。要正正经经地对待生活，最终结果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。对别人生命的冷漠，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一息尚存的生命的珍惜，这就是“文革”创造的文化生态。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取向，渗入我们的血液以至骨髓。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品二典二藏
贤亮

散文卷

美丽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美丽: 散文卷 / 张贤亮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3.5

ISBN 978-7-221-10881-4

I. ①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3300 号

散文卷·美丽

Sanwen Juan Meili

作者 张贤亮

责任编辑 梁永雪 宋鑫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32 千字 印张 15

ISBN 978-7-221-10881-4

定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辑 文人参政

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/ 3

我的态度 / 31

“三个代表”拓展了中国的未来 / 39

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/ 42

加强地方人大、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/ 46

“公务员法”中应增添家庭财产及收入定期申报条款 / 48

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/ 50

拖欠民工（员工）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/ 52

建设文化大国 / 54

中国文化产业概谈 / 57

西部吸引人才应有新思路新办法 / 73

莫让孔雀东南飞 / 75

发展职业教育，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 / 78

关于筹建“文革”博物馆的提案 / 81

“不可说” / 83

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”应该是有传承性的、兼容并蓄包罗万象的系统 / 99

第二辑 文人经商

“文人下海” / 107

宁夏有个镇北堡 / 115

出卖“荒凉” / 134

西部企业管理秘笈 / 141

“全盘推出，闪亮登场” / 165

关于文化产业及宁夏旅游的汇报提纲 / 170

第三辑 “文革”回想

今日再说《大风歌》 / 181

美 丽 / 183

第四辑 文人观点

也谈“小人” / 207

参与、逃避和超越 / 213

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/ 217

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/ 220

雨·天话语 / 222

国际接轨第一功 / 231

第一輯 文人参政

新學文

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

——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

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“思想解放”运动，在中国思想史、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 20 世纪史上，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，我认为大大超过“五四运动”。那不是启蒙式的、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“赛先生德先生”大旗掀起的思潮，而是一种迸发式的，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，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，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，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。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，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。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，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。没有人的解放，便没有思想的解放。所以，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“第二次解放”，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“解放”。

—

直到 1978 年底，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。职业是“农业工人”，而身份却很复杂，头上戴着好几顶“帽子”。为什么说“好几顶”呢？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？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？当然不是。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。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：一顶是“右派分子”帽子；一顶是“反革命分子”帽子，这两顶帽子是“实”的。“实”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

档案的。可是什么叫做“正式文件”，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。

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，想表述明白，让现在 50 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。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。虽然小说有想象的、虚构的成分，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，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。可是，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，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，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，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，仔细推敲。可是，我发现，这一来，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。因为，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，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，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“崭新”的意义替换了，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，变得模糊。其实，我们现在说的“拨乱反正”，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“拨乱反正”。其中很多我们已经“反正”过来了。正因如此，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。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，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，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。孔子说了句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被质疑了上千年，就因为“女”在古文中常作“你”和“你们”解，而现代汉语只当“女性”和“妇女”讲，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。因而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，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词语也加以解释。

同时，作为一篇个人记录，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，虽然这已经很方便，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，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。可是那样一来，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，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，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。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，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，只有极少数人掌握，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，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，无处求告。所以，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，但它虽非“历史”却是“史实”。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：“历史”往往与“史实”不同。

譬如，就拿那时的“正式文件”来说吧。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“正式文件”的形式去看，那绝对是非正式的，是个笑话。可是，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“非正式”的“笑话”之中，而且长达近 30 年之久，今天的中

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。难就难在这里。

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。

首先，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“右派分子”呢？在1957年“反右运动”中，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“右派”当然非常之多，因为那时定有指标，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%来“打”（你看，这个“打”字又须有注释，但类似的词语太多，此处只好从略）。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，“打”出来的“右派”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，所以，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。这个决定某人是否“右派”的机构叫做“五人小组”。各地县、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“五人”。可是这“五人”具体姓甚名谁，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。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，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“右派”，可见，还有更高层次的“五人”。总之，说你是“右派”你就是“右派”，别问出处，也问不清楚。

这样一下子，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“右派”，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“知识分子”的人数只有550万~600万。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“右派”平反的文件，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；550万~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。

这里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“打”字。“打”一词，在“反右运动”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，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“划”为“右派分子”一说，可是后来给“右派分子”平反时，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“错划”的说法，其实应称为“错打”才对。

好了，不说别人，就说我自己，这是最可靠的。

我发表长诗《大风歌》正值1957年7月，“反右运动”最激烈的时候，《人民日报》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《斥大风歌》。《人民日报》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，当时简直就是“圣旨”，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“右派”，受到处理“右派分子”的顶级惩罚：开除公职，押送劳动教养。

“正式文件”是怎样的呢？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。到1979年我平反时，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，类似“派送单”这样的东西。我名字后面，填写的是“反党反社会

主义坏分子”，而不是“右派分子”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“右派分子”的法律根据，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“打”成“右派”的原因，即具体的“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”。这张纸我见了，只有巴掌大，纸质脆薄，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。我认识这种纸，那叫“雪莲纸”，用稻草造的，因为它不经磨损，不耐存放，一般只写个便条，写信都不用它。而这劣质的“雪莲纸”却奇迹般地在我的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，拿出来还灿然如新。

然而，麻烦也就来了，如果我是“坏分子”，我就不再专门针对“右派分子”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，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，“坏分子”早就该“甄别”了。可是，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“右派分子”对待的。怎么办呢？

幸好，这已经是1978年，开始实事求是了。原来我的大麻烦，即当年《人民日报》及地方报纸、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，又成了我是“右派分子”的证明，从而让我有资格“享受”文件精神予以平反。“不幸”与“幸”的转换，需要我等待22年。后来，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“右派”的前领导，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订为“坏分子”而不是“右派分子”。他笑着说：你只发表了一首诗，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，年纪又轻，我们研究了一下，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，就定个“坏分子”算了，“坏分子”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。我理解他们的宽厚，“地富反坏右”这五类分子中，看起来只有“坏”没有政治性。他们哪知道后来“地富反坏右分子”通通在一个菜篮子里，最后“一锅烩”了。我也笑着告诉他：到了地狱，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，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。他却说：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？不然，你怎么能有今天？于是，那个“五人小组”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。

这样看来，“五人小组”能网开一面，当然也能指鹿为马，把不应是“右派”的人打成“右派”。同样也说明了，当年报纸杂志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“众口铄金”的功能，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。当年，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，大家说你是什么，你就成为什么，何必有“正式文件”！

你看，我受了22年苦，就因为这张薄薄的“雪莲纸”，这就是“正式文件”！

我生于1936年，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、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

生。这也来自“正式文件”。

1968年2月，我第二次劳改释放，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。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。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，干脆点说，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。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，丢给我一张纸，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。在出生年月日一栏，我如实地填上“1936年”。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，说：你明明生在1938年，为啥填1936年？我奇怪地问：哪来的1938年？干部指着释放证说：你看，你看！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，你还要赖！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。我一看释放证，又是那倒霉的“雪莲纸”，劳改农场干部用蘸水钢笔写1936的“6”时可能蘸了一下钢笔水，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。我哪敢跟干部犟嘴，他说是8就是8吧。

这个“正式文件”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，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。

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“正式文件”交代明白。这个“明白”也是我自以为是的，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。回忆往事，常常用“隔世之感”这句成语，我想，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“隔世”。近30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，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。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，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。所以，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。

二

说了“正式文件”，我还要说说“帽子”。仍不用现在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，还是谈我自己的遭遇。

我的“右派”帽子如上所述，另一顶“反革命”帽子怎么来的呢？读者千万别以为我这个人特别坏，中国，在30多年前，某人被戴上一顶“帽子”后，一不小心很快就会被戴上另一顶“帽子”，绝非我一人时运不济，亿万人都命途多舛。那时的“帽子”有如今天商场里的廉价商品，是“买一送一”的。应该说，我还是比较侥幸的一个。首先，我活下来了；其次，我还有在这里细数

“帽子”的闲心，更重要的是：我毕竟有“雪莲纸”为证。更有数以万计人被当成各种“分子”受苦受难20多年，到1978年平反时，在他或她的个人档案中却找不到“正式文件”，连一张巴掌大的“雪莲纸”也没有，从而得不到“甄别”或平反。这就是众口一词、约定俗成的厉害。当初在众人口诛笔伐、千夫所指下稀里糊涂地成了“分子”，被抓了，被关了，被开除了，被下放了……弄得穷途潦倒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好不容易熬到命运的转折期，却因为根本没有“正式文件”，最后只能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。幸亏已是1978年以后，全国都不再讲人的出身成分、个人身份了，一致“向前看”吧，都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倒腾沉浮去了。

“反革命分子”帽子，是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到农垦农场就业后，碰到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戴上的。当年，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，都以“公审大会”开路，以显示“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”，先给人民群众来个当头棒，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也不例外。公审哪些人呢？首当其冲的是有历史问题的人。欲抓现行，先抓历史，这是最方便的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，每次政治运动都如法炮制，一直延续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更变本加厉。“一个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两次惩罚”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学原则，而30多年前的中国，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。一个人只要过去有点污点，就会不断被泼污水，弄得越来越脏。当然，还得在此类人身上抓点“现行”出来，没有一点“现行”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。将有历史污点的人先抓出示众，就如先播下病毒，然后逐渐向外扩散，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，把普通人变成“敌人”。这是政治运动的步骤，是规律，所以建国以后不是“敌人”越来越少，而是越来越多。

试想，要在一个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来的道理？毛泽东就说过：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”

1965年我被判为“反革命分子”的“现行”有哪些呢？一是知情不报，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（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）；二是破坏生产，把我在灌溉稻田时冲断一条田埂说成是有意破坏，而当时我一人管300多亩稻田，比“革命群众”管的多得多，却长势最好；第三，我就要说件很滑稽的事情：1965年以前，就有一批在北京、天津不好好上学或是被开除，或是失业在家

的中学生“上山下乡”来到宁夏农垦农场劳动。一天，在田里干活时，一个天津女“知青”看到一个农工跨过田埂就解开裤子尿尿，她在城市里哪见过这种场面，竟连惊带羞哭了起来。我在一旁说了一句：“嗨！你走远些嘛。你看，你在那边尿尿，人家在这边哭哩。”这句话经分析，就成了“把知识青年的眼泪比作尿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’号召”。

今天听来令人啼笑皆非，可是当时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、符合逻辑的推理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错了，至少这句劝说别人的话有很大的语病。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。今天看来既荒唐又可怕，我们可以批判它将芝麻大的事“上纲上线”，陷人以罪，然而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，是以“阶级斗争”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历次政治运动，如“土改斗争”、“思想改造运动”、“忠诚坦白运动”、“镇反运动”、“肃清反革命运动”、“农业合作化运动”、“三反五反运动”、“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”、“反胡风运动”、“反右运动”、“反坏人坏事运动”、“反右倾主义运动”、“四清运动”、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等一系列运动中施行的阶级斗争教育，逐渐培养出人的线性思维：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可最后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，都能够和阶级斗争挂钩，甚至从一个人拿铁锹的姿势也可以看出此人是否劳动人民出身，从而分清“敌我友”。

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曾在这种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中受害。受害者本人也抱着这种思维方式，所以受了害还觉得自己无理。

当然，“公审”不止我一个，在任何场合、任何地点，每次“公审”都是成群结队地将一批“五类分子”和有历史污点的人拉上台。“敌人”越多才越能证明形势紧迫，政治运动确有必要。那天，农场就有30多人在台上一字儿排开。银川市法院来宣判，我判得还算轻：“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，管制三年”。其他人有的“当场释放”，以示“宽严结合”，有的判三年、五年、八年、十五年，立即被押送到监狱去了。

法院的判决书，也就是“正式文件”呢？我没看见，至少是当时没给我看，叫我无法上诉。我只是从法院干部在台上朗朗地宣读中知道自己“罪行”的。

1979年有关单位给我平反时，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抽出来准备销毁，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，仍旧是薄薄的“雪莲纸”，但比巴掌大，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，油印的，长达好几页。办理平反的干部仔细看了后大吃一惊。他吃惊的是我的“坦白书”。原来，先前我听了反动言论不汇报被揭发出来，农场生产队书记责令我写份坦白交代材料，我竟写了份“万言书”，坦白交代了我的真实思想。判决书上摘录了坦白交代材料上的许多话。可是，让人意想不到我坦白交代的思想完全符合现实的发展，到1978年，形势竟朝着我当年的思路来了。这里我就不详细叙述那时我想了些什么，但其中这段话可以说一说。当时，生产队书记特别要我交代为什么我听了反革命言论既不汇报，也没有参加他们的“反革命集团”。我是这样交代的：

我认为，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“自然灾害”造成大饥荒时，国内都没有出现暴力的反党活动，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非常稳固，是不可能用暴力推翻的。我相信，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，所以我没有受他们拉拢。

我揣摩为什么宣判那天没有当众宣读我这部分“反动言论”。其实这部分才是“精华”，宣读出来肯定会造成影响，台下的听众会中我的“流毒”而对未来有所期望。可是，我说什么“健康力量”，无形中就指当时党的领导不是“健康力量”，竟然给我轻判，我不能不承认当年“量刑准确”。

那位领导说“你怎么能有今天？”，就因为我当年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。

不过，这份“坦白书”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又成了我升级为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的罪证。

“右派分子”、“反革命分子”是实的，来由如上。至于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可算是虚的，是没有“正式文件”的。

三

好了，实实在在的帽子算清了。虚的呢？

第一顶还不是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应是最早的“资产阶级出身”。

至今我还没有搞清楚“出身”和“成分”的详细区别。前面说了，我也不想到网上去查，我要写的是我真实的认识状态。一个吃了20多年“出身”“成分”之苦的人糊里糊涂活到今天，也弄不明白“出身”、“成分”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，可见当年活在怎样错综复杂、扑朔迷离的环境里。我还算是个有点知识的人，千千万万受“出身”、“成分”之累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更不明不白了。

且就我的“知识”从头说起。

在城市，从1949年户籍登记开始，从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到就业必须填写表格开始，你就有了一个“身份”。在“家庭成分”一栏里，有“工人”、“城市贫民”、“资本家”、“小业主”、“自由职业者”（如记者、律师、演员）、“革命干部”、“旧职员”等等，爸爸是教书匠怎么填呢？那就填“教师”。我记得开始时还没有分阶级，多半以上辈人的职业为准。1949年解放时我刚上初中，填写的是“资本家”，其实是已经被抄家的“官僚资产阶级”，填“资本家”降了好几格。从此，“资本家”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。

在农村，老解放区是1948年，新解放区最迟从1950-1951年“土改”开始，所有农村人口都被定了“成分”：地主、富农、中农（中农又分上中农、中农、下中农）、贫农、贫雇农、雇农等等；地主中还有一种“恶霸地主”和“小土地出租”。前者多半在土改斗争时就被枪毙掉了，后者则指农村的孤儿寡母或残疾人，自己不能种地而将土地出租给他人，这还体现了一点实事求是精神。

绝不是到此为止，所有农村人口的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一直继承上一代人的“成分”。地主的儿孙也是地主，富农的子弟仍是富农。虽然已经继承不到什么物质财富，虚的“帽子”还是可以继承的。“成分”，已经溶化到血液中，

随血缘关系往下传，往四周扩散。不说你的老爸是地主，只要你家有个亲戚是地主、富农，你就是个不干不净的人。“文革”时期著名的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狗熊儿混蛋”这个血统论的宣言，实际上在解放初期就播下了种子。

在农村的“土地改革”、城市的“私营工商业改造”这种生产关系的革命完成以后，财产关系已经转移以后，也即“剥夺剥夺者”完成以后，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有产阶级已不复存在，但要继续高举“阶级斗争”的大旗，就必须保存“阶级”；要把“阶级斗争”大旗扛到底，“阶级”也就必须不断传承下去。由谁来继承呢？当然由他们已经失去土地财产的子孙后代继承最合适。至于到了“文革”时期，又发明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”，那已是后话，不提。

这样，从城市到乡村，一直遍及穷乡僻壤、边远山区、荒原牧场，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到中期，全国就迅速地编织成一套“身份识别系统”。任何人都别想逸出这个系统自由自在地生活。因为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粮、油、布匹、棉花直至火柴、香烟、肥皂等等生活必需品的购买票证，都根据这个系统发放。没有种种票证你便不能买到实物，便不能生存，除非你有跑到深山里去当“白毛女”的勇气。

在城市和农村，所有票证的发放按人口分配，只有因工种的不同而付出的劳动量的不同，在数量上有所差别，再没有其他差别。普通市民分得的票证不会比资本家多，贫雇农分得的票证也不会比地主富农多，这点还是公平的。

但是，由“身份识别系统”所建立起的“身份识别制度”，却使“身份”、“成分”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方面有着天壤之别。

这里不说老一代人了，老一代人肯定已经被斗得灰头土脸，抬不起头了，有许多甚至被“关、管、杀”了。就说年轻一代，首先是上学，家庭“成分高”的学生就没有领取助学金的资格，尽管你家已经比贫民还贫，成绩好也不会表扬到你头上，你根本没有当“班干部”的份儿；考取了大学，“成分高”的子弟就很难通过政审这一关，家庭成分是政治审查的首要环节，何况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公开宣示只招收家庭成分好的学生，“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”嘛。毕了业就业，“成分高”的学生别想分配到好工作。“到边疆去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”，这个口号就是“成分高”的毕业生的前景。